

寻租、权力腐败与社会福利 ——基于公共品供给的视角

逯 进

(青岛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摘 要:激励与监督机制缺失是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由此不但容易模糊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造成上下级政府间垂直监督的缺位,而且也会对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产生抑制,从而诱发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以及社会福利的损失。基于这一逻辑关系,文章在引入寻租因素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从公共品供给视角讨论了委托代理、政府寻租与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关系,借此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官员权力腐败的成因、过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出了系统的解释。

关键词:公共品;委托代理;寻租;腐败;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9-0122-10

一、引 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经过30年的努力,政府职能已发生重大转变,国家已初步建立起了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框架体系,政企逐步分开,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逐步减少,对市场的监管以及服务意识开始逐渐增强,由此极大地刺激了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此外,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创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政府运作的基本要求。同时,政府决策机制日趋科学化、民主化、透明化,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行政理念不断增强,公民权利受到重视和尊重。

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但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组织结构设置不合理、行政层次偏多、职责交叉重复;行政管理方式还存在着决策民主化程度不够、透明度不高、随意性较大、责任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由此导致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未有根本性的提高。根据国际权威机构——瑞士洛桑的国际管理开发学院(IMD)发布的各年度《世界竞争力年鉴》(The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显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中的政府效率1997年为第14名,2002年为第31名,

收稿日期:2008-02-28

作者简介:逯进(1974—),男,甘肃兰州人,经济学博士,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2005 年为第 21 名。此外,近年来主要以经济绩效为标准来评价政府效率,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一味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执政目标,想方设法增加地方性投资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很明显的一个事例就是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主要形式的公共品过度投资,而由此产生的供求失衡导致了公共品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扭曲,并诱发了官员的腐败。

上述问题的出现,表明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无法从根本上有效约束政府官员的违纪行为。因此,加快和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协调两种改革的关系和步伐,使行政管理体制成为经济改革的润滑剂,创造经济发展的民主政治环境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是需要对行政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深入的剖析,特别是对当前较为猖獗的官员腐败所依赖的制度路径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做出明确判断和评估。基于这一目的,本文以公共品供给为例,分析了公共品投资中政府官员的行为与社会福利变化的关系,并建立了一个理解和量化官员寻租与腐败行为得以产生和存在的逻辑过程和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对政府官员和消费者的行为模式、公共品投资与收益过程以及相关制度结构做出了解释。

在展开分析之前,需要梳理清一个重要且不可回避的现实逻辑关系,这一关系可以作为本文的总前提,它涵盖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源于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从而使地方可以得到部分切实的权力;第二,中国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采用的是“锦标赛制”的模式,该模式的优点毋庸置疑,但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一系列扭曲后果,突出表现为典型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第三,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央或上级政府有权决定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即具有集中的人事权。因此,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典型的“下管一级”的垂直型干部管理体制。这一体制不仅管理模式单一,而且由于存在人事权的相对集中性,在干部任免方面突出表现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官员政治升迁或任免的直接决定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体制并未与其他体制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与监督体系来约束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这三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便自然形成了这样一个行政管理流程:地方政府官员为获得政治升迁,获得下放的权力后,在“锦标赛”体制下,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为执政目标,而这一目标往往会与社会真实需求之间出现偏差,但垂直型管理体制无法对偏差做出及时而全面的纠正。

二、公共品供给中的委托代理循环模式

为此,我们给出以下假定并展开分析。

假定 1:公共品有两种类型,即正常公共品和非正常公共品。本文对非正常公共品的定义为:超过公共品正常供给量的部分,即公共品的超额供给部

分,最常见的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假定 2:研究对象有两类:地方政府官员和消费者,二者为具有不同需求目标和权力边界的经济利益主体。

假定 3:公共品投资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出,如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性税收和强制性费用摊派等。

以上述假定为基础,前期研究表明,公共品的正常供给会给消费者和地方政府带来效用的增加,进而使社会净福利增加。但有时政府官员会在物质利益和名誉收益的双重引诱下主动供给超额公共品,由此,政府官员的收益会不断增加,而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超额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如果超额公共品投资来源于国家(上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或转移支付,则消费者和政府的收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生产成本只能由唯一的出资人——国家来承担,进而形成了国家财政的沉淀成本。同时,因超出市场最优的、低效率的供给需要占用额外的生产要素,因而额外投入的机会成本很高,主要表现为将其他高效的生产投入转入到低效的超额公共品生产中,从而造成生产性扭曲。此时,地方官员因公共品超额供给所带来的收益体现在物质收益和政治升迁两个方面,而且后者往往是其更加看重的。如果要考虑领导者的成本,那么这种成本也只是由消费者的负面评价带来的效用降低所造成的隐性成本,而这一成本往往又可以通过行政性手段来降低甚至消除。另一方面,如果超额公共品的投资来源于消费者,如地方性税收或费用摊派,则消费者不但要承担本应由国家来承担的生产成本,还要承担因超额供给而带来效用降低的隐性成本,从而使其个人的福利受到加倍损失,但政府官员依旧未承担任何成本。

上述分析结论表明,非正常公共品有其特殊的供给过程,要实现这一过程必须具备特定的制度路径。那么这一路径是什么呢?

假定 4:公共品供给中政府官员的腐败源于政治性诱致。

命题 1:在监督机制健全、信息传递真实度和透明度高的政治制度下,公共品会以正常的政治性诱致方式供给。但在信息不对称、缺乏行政约束与监督机制时,地方官员对公共品的供给动机趋于功利化,从而出现个人的“败德”(moral hazard)行为。

命题 2: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预算软约束、激励扭曲和代理扭曲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是造成地方政府官员出现“败德”行为的诱因。

运用委托代理的循环模式可以对命题 1 和 2 做出证明。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有超额供给的动机和行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激励和监督缺位。在我国,政府由平级人大选举产生并接受其监督,然而实际情况往往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直接任命,“对上级政府负责制”是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此要想继续升迁,地方官员就会大做表面文章以博取上级领导的认同。这样在任期届满时,形象工程这样的表面文章就会带给他

政治升迁的筹码,而等他升迁并调离原地区后,留给下任政府的可能是巨额债务。有鉴于此,下届政府可能会将这一模式继续下去,从而形成了一种循环怪圈。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当前出现此类问题的根源在于行政管理体制已从制度上形成了循环的路径依赖,并由此产生了典型的委托代理问题。

这里的委托代理框架包括两个委托人和一个代理人,分别是上级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下级委托人——地方消费者(纳税人)、代理人——地方政府官员。基本的原则是委托人委托代理人去从事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工作——生产正常公共品。但代理人通常仅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动指南,并试图以欺骗和强权来对付委托人,掩盖自己的功利行为。

如图1所示,路径依赖的循环过程由四部分组成:第一,两委托人给代理人投入资金以组织公共品生产,资金的来源分别为财政支出、银行信贷(G)和地方性税收(T),同时,委托人给代理人发出了为其提供有关公共品生产信息的要求。第二,两委托人会采用不同的监督机制——上级政府的纵向监督与平级人大的横向监督,参与对代理人生产行动的约束中。但目前尚未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会造成两委托人发生激励扭曲,具体表现为“模糊产权”、“预算软约束”及“人大监督缺位”,从而很难对代理人形成有效约束力。第三,委托人激励发生扭曲时,相应地会引发代理人的代理扭曲,具体表现为“棘轮效应”、“显示成本最小化”、“事后成本最大化”以及“硬性摊派”四个方面。代理人会通过政绩显示和权力扭曲(因缺乏约束所造成的权力滥用)来应对两委托人,从而将公共品投资转化为事后的最大成本并转移给委托人。第四,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上下级代理人之间应保持正常的信息传递,但代理人有可能会阻碍传递,具体来看主要有两种可能:首先,代理人会发出不完全信息来蒙蔽委托人;其次,在信息传递链条过长的情况下,下级委托人即便能获得真实信息,也由于传递成本过高而很难传递给上级委托人,特别是如果代理人运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阻挠或控制上下级委托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时,上级委托人就更难获得真实信息。图1中的信息流①、②表示了这两种信息流动的方式。此外,如果上下级政府官员之间存在勾结,则真实信息的传递通道更是形同虚设。

一旦出现上述委托代理问题,政府官员的寻租与败德行为便不可避免。

三、公共品供给中的寻租

假定5:区域内只生产公共品和一般物品两种产品。一般物品可以看做是除公共品之外其他物品的综合。地方政府部门对一般物品的生产可以进行数量控制。一般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相同,即在无其他成本的条件下,两物品的交换比例为1。此外,公共品无销售成本,但一般物品必须要付出销售成本——销售人员的工资。无国际和区际贸易。

假定6:两种产品生产只使用一种要素——劳动力。区域经济活动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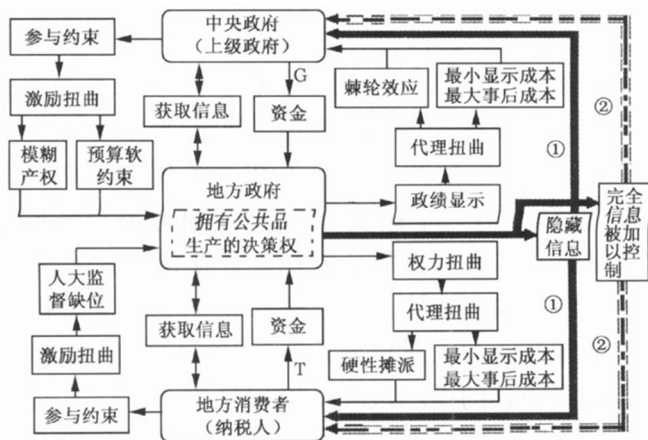


图 1 公共品供给中的委托代理模型

劳动力投入总量固定,并可分解到三种用途上:公共品生产、一般物品生产与销售、寻租。如果不存在寻租活动,则劳动力全部投入生产或销售活动。对劳动力工资的支付就是地方政府在公共品生产中的总投入。一定时期内,政府用于购买或生产的投资额为定值,且消费者的总收入不变。

假定 7:考虑到市场供求与寻租的关系,本文将公共品供给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达到公共品总供求均衡时,政府对一般物品的产量没有限制,两物品的生产与销售无寻租行为,我们将这一状态定义为自由市场模式;第二,政府部门对一般物品的产量有限制,同时公共品供给量超过均衡供给量,但两物品生产和销售中无寻租行为,我们将这一状态定义为半自由市场模式;第三,政府部门对一般物品的产量加以限制,同时增加公共品生产投资,使供给量严重超额,生产和销售中存在寻租行为,我们将这一状态定义为非自由市场模式。

命题 3:政府部门是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因而具有供给量的决策权,但政府官员的寻租意愿往往会引致供给量背离供求均衡的原则。

命题 4: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公共品超额供给决策的收益来自两个方面:物质收益和名誉收益。后者是其职位升迁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更受重视。而部分官员可能会有“名利双收”的偏好,即他们会同时考虑政治升迁和物质收益。正常的物质收益(如工资收入)往往不能满足一些政府官员的需求,他们就会运用手中权力所赋予的垄断力量来收取租金,从而全部转变为其个人的灰色收入。

如下采用克鲁格范式对上述命题做出证明。如图 2 所示,OF 和 OQ₀ 分别为区域内公共品和一般物品的供给量,Q₀₂F₁ 曲线为生产可能性边界(PPT)。

第一阶段:自由市场模式下,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效用水平由效用曲线 U 代表,此时 U 与 PPT 曲线相切于点 E,社会供求达

到最优状态,公共品和一般物品的消费量分别为 C 和 Q_{03} 。此时,竞争使生产和销售活动的工资相等。

第二阶段:半自由市场模式下,地方政府以政策垄断限制一般物品的供给量减少至 Q_{04} ,并促使部分劳动力流出销售部门而进入公共品生产部门参与公共品生产。因而公共品供给量增加至 G 。在这一模式下,公共品超额供给和一般物品消费不足从两个方面降低了全社会的效用水平,消费者效用减少为 U_1 。在这一阶段,公共品生产部门的总投资不变,而劳动力数量增加,导致该部门工资降低。相反,一般物品求大于供,则从事一般物品生产与销售的劳动力工资上涨。工资差形成了自然租金,导致低工资部门的劳动力都有向高工资部门流动的倾向。因为政府官员此时无寻租行为,因而能继续从事一般物品生产与销售的劳动力可以认为有突出的能力,从而将低能力的劳动力挤出本部门,并享受了更高的报酬租金。

在第三阶段:非自由市场模式下,政府对一般物品的限量还是 Q_{04} ,且政府官员开始主动寻租。自然租金的存在,使公共品生产部门的部分劳动力流出本部门,他们可看作是专门从事寻租并游离于正常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之外的劳动力。此时,公共品生产部门的总产出因劳动力流出而减少,公共品供给量从 G 下降至 A ,全社会可供消费的物品总量减少,消费者效用曲线也降至 U_2 。

政府部门设置的销售壁垒,产生了上述自然租金及非生产性劳动力损耗。进一步来看,如果政府官员有主动寻租动机,便会通过对市场的控制来设租,如对一般物品的生产和销售发放许可证。这样,有寻租动机的劳动力会通过各种手段,如贿赂政府官员,来获取许可证,从而政府官员的额外收益就增加了。此外,公共品的生产一般由政府出资并指定生产者,这样无形中又形成了一种生产许可,生产企业为获得生产许可并进而得到政府投资,也会贿赂政府官员,这样官员个人的额外收益又有增加。

由上述分析可知,政府对市场的垄断以及政府官员的双寻租产生了如下非生产性及生产性效率损失:第一,两种许可证的发放,使部分生产性资源转化为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从而降低了社会的产出总量;第二,公共品生产者在将部分生产性投资转移给政府官员后,形成了生产性成本,这样只能通过偷工减料等手段来降低成本,从而其所生产的公共品是质次价高的;第三,游离于生产和销售部门之外的寻租劳动力,其寻租活动未给社会带来任何财富的增加,相反却降低了社会的福利水平。

更进一步看,如果将假定 6 的条件放宽,即政府部门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追加投资,从而可以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公共品,会进一步产生公共品超额供给,社会福利变动又有新规律。第一,投资来源于区域外,如中央或上级政府,则公共品的最大供给量可达 F_2 。这样在保证一般物品最优供给量 Q_{03} 不变的条件下,公共品实际供给量增长到 I ,此时,生产可能曲线与消费者

效用曲线相切于新的均衡点 E' 。而地方政府和消费者都未承担超额供给的投资成本,但都获得了由超额供给带来的收益。消费者收益为无偿消费更多数量的公共品,虽然他们可能并不需要消费这些额外数量。结果形成了国家财政的沉淀成本。从而使消费者的效用被动达到更高的水平 U'_3 。第二,投资来源于区域内,即全部要由消费者承担。此时,公共品最大供给量还是 F_2 ,但消费者因额外承担了公共品投资成本,导致其对一般物品的消费量减少,则新的均衡点变为 E'' 。在该点,消费者对公共品的正常需求量未变,还是 C ,但对一般物品的消费量缩减为 Q'_{04} ,因而其效用曲线下降为 U'_3 。进一步分析,从消费者心理反应来看,如果对一般物品的消费减少,则其对公共品的正常消费欲望会降低,即与 Q'_{04} 相对应,公共品需求量将减少至 K ,由此导致消费者效用水平进一步降低至 U''_3 。

概括之,如果在公共品供给中存在政府部门的垄断及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其实质在于将原本应该用于生产的部分劳动力资源投入到无任何收益产生的自然寻租活动中,从而丧失了这部分劳动力的产出,而且政府的许可证制度可能将部分正常的公共品投资转化为官员租金收入。这样,劳动力和资本的非生产投入从两方面降低了社会福利,同时滋生了官员腐败。

四、非正常公共品供给中福利损失的衡量

以上分析表明,在公共品供给的三个阶段中,由于消费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收益目标及获取收益的能力完全不对称,结果致使政府官员侵占了消费者的福利,并造成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但这一损失该如何衡量呢?

公共品供求变化导致社会福利变化的过程如图 3 所示:首先,在达到供求均衡点 E 之前,随着公共品供给数量的不断增加,需求量也不断增加。此时,需求大于供给会引致供给价格的上升。已有研究表明,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下降,总收益在不断增加,同时,地方政府官员的边际收益和总收益都在增加。在达到 E 点时,整个社会公共品供求达到均衡,供给达到最优状态。其次,如果地方政府官员在均衡供给量 C 的基础上继续增加供给,如增加到 D ,则会出现 $\Delta Q = D - C$ 的超额供给量,超额部分的实际供给价格由 P_3 上升至 P_4 。

如果 ΔQ 的投资来源于财政支付,则消费者没有承担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增加,消费者的需求被动地从原有基础上增加了。虽然 ΔQ 是非正常意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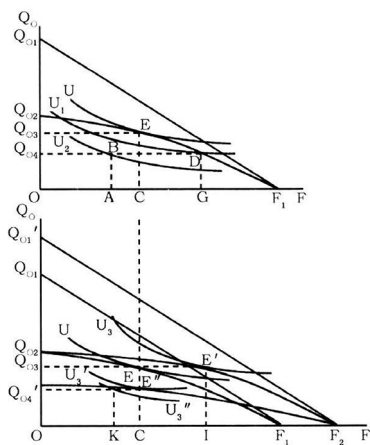


图 2 公共品供给中的寻租模式与社会福利损失

需求,但因为来源于无偿供给,所以即使消费者的边际收益下降到 MR_2 ,其总收益还是会增加。此时在 P_4 这样的高价格下供给,而在 P_2 这样的低价格下需求,中间的价差便由国家来承担,即财政支付使地方政府官员和消费者都获益,收益增量分别为“5”和“7”。^④如果 ΔQ 的投资来源于消费者,则意味着上述价差由消费者来支付,此时,消费者收益增加“7”,但同时其成本也相应增加了“5+6+8”,其中“5”为政府官员的收益增加。

上述两种情况下,社会的净福利都减少了“6+8”。“6”和“8”分别为生产扭曲和消费扭曲带来的损失。不过因投资主体不同,这部分损失分别由国家和消费者来承担。此外,如果公共品在 D 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增加供给,则社会净福利损失更大,如供给达到 F,则净福利损失为“6+8+9+10”。

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可能还存在一种极端的情况:如前文所述,虽然消费者支付了超额供给量 ΔQ 的投资,但并无对此的需求,特别是从消费者心理反应来看,由于供给价格上涨,其需求量反而会降低。这样,在公共品实际价格由 P_3 上升至 P_4 后,消费者的实际需求量降至 B。此时,消费者收益减少了“1+2+7”,但地方政府仍有“5”的收益增加。这样,社会总收益减少了“1+2+7-5=1+2”,社会净福利损失变为“1+2+6+8”。

这里还需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为何地方政府官员的边际收益在持续增加?根本原因在于公共品的供给目标与一般商品的供给目标是不同的。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只有价格下降,一般商品的需求量才会增加,因此企业的边际收益会随价格下降而出现递减;同时,生产的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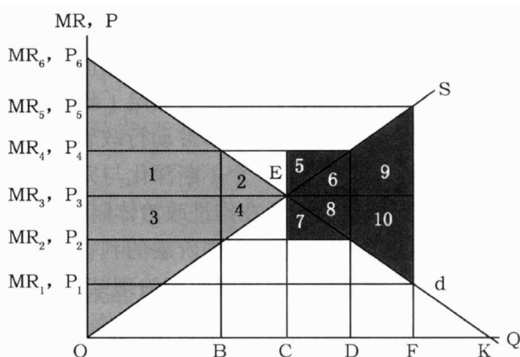


图3 非正常公共品供给中社会福利损失的测度

模报酬递增也存在一个收敛边界,任何生产最终在达到这个边界后都会出现规模报酬递减。这样,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边际收益最终会出现加速递减。而企业家作为经济人,一定会寻求在上述两种约束下的最优边际产出点。但地方政府进行公共品供给时,即便意识到边际收益加速递减,但因其自身并不承担成本,故其收益不受影响,即地方官员的成本与收益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变量。这样,地方领导者的收益不受成本约束,其供给的公共品越多,收益也越大。第二,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成本该如何度量?这里应考虑两种成本:社会成本和机会成本。公共品超额供给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来源于超额生产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负面舆论,这只能通过职位升迁时的

社会评价来体现。而机会成本则只能通过特定的投入—产出进行估计,即将公共品投资的收益与该资本用于另外用途时的最大收益进行比较,差额即为最大机会成本。这两种成本的和,即为总成本。不过由上述分析可知,地方官员一般不会顾忌总成本的增加,他完全有能力隐蔽社会成本,且将机会成本转嫁给国家和消费者。

五、归结与探索

当前在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激励扭曲和代理扭曲,同时,代理人——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边界也较为模糊,从而刺激了部分官员的设租、寻租动机,并诱发了权力腐败,进而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也反映出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尚不完善,垂直和平行两方面的监督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寻租与腐败是各国在特定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转轨过程中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寻租与腐败问题,同时,这一现象并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在经济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因此,对待我国目前的寻租与腐败问题,必须秉持客观态度,一方面,这一问题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和发展所支付的代价;另一方面,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的经验表明,抑制腐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目前的内外部环境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也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因此,以政治体制改革带动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从而有效抑制政府官员的寻租与腐败将是一个不断深化与完善的过程。

鉴于上述认识,今后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应重点明确界定不同行政主体的权力边界及公平分配不同阶层的利益,从而在尽可能满足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前提下,建立行之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效遏制官员权力腐败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以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先决条件,以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突破口,以两种改革的协调并进为目标,我国应尽快完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强化上级政府、平级人大和政协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监督功能,并切实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权力。

基于上述要求,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设计一个完善的、用于规范地方政府官员违纪行为的制度体系是关键,核心思想是通过规则约束、强化监管、经济绩效、政治竞争四种手段来加强对代理人行为的约束与引导,从而限制其寻求非正常收益的“个人理性”。除人大和政协外,对国外成熟制度的借鉴、设立不同层级并独立于行政体系的其他治理结构、加强建立在充分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民间组织监督是制度创新与建设的可行选择,这几个方面都应作为制度体系建设的重点。在实际运行中,这一体系应具有以下特点:制度应该具有可

操作性及低运行成本、尽量减少实施者的变通余地、维持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提高违规成本、个人决不能凌驾于组织与制度之上。此外,还应辅之以公正可行的评价与考核体系,以加强对干部执政能力的有效量化。只有这样,才会真正实现两种改革的相互促进与协调发展,这也是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 [1]周黎安.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J].经济研究,2004,(6):33—40.
- [2]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3]逯进. 论公共品供给的政治性诱致与政府行为[J].宁夏社会科学,2005,(2):41—44.
- [4]速水佑次朗.发展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5]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6]李军杰,钟君.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基于公共选择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04,(4):27—34.
- [7]Anne O,Krueg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3):291—303.
- [8]Anne O,Krueger.Government failure in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74,4(3):9—23.

Rent Seeking, Power Corruption and Social Welfare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of Public Goods

LU Jin

(School of Economic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principal-agent issue is due to the lack of incentiv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It not only blurs power boundaries among governments and leads to the lack of vertical supervision, but also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nd especially induces government corruption and losses of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this logic relation and rent-seeking factor,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rincipal-agent, governmental rent seeking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good supply. Owning to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reasons of power corrup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Key words: public goods; principal-agent; rent-seeking; corruption; social welfare

(责任编辑 许 柏)